

新体系档案学系列规划教材

总主编 丁海斌

档案学概论

DANGANXUE
GAILUN

主编 丁海斌 方 鸣 陈永生

■ 辽宁大学出版社

新体系档案学系列规划教材

总主编 丁海斌

档案学概论

DANGANXUE
GAILUN

主编 丁海斌 方 鸣 陈永生

■ 辽宁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档案学概论/丁海斌, 方鸣, 陈永生主编. --沈阳:
辽宁大学出版社, 2012. 6
新体系档案学系列规划教材/丁海斌总主编
ISBN 978-7-5610-6809-0

I. ①档… II. ①丁…②方…③陈… III. ①档案学
—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G27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38671 号

出版者: 辽宁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中路 66 号 邮政编码: 110036)
印刷者: 抚顺光辉彩色广告印刷有限公司
发行者: 辽宁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幅面尺寸: 170mm×240mm
印 张: 14.5
字 数: 270 千字
出版时间: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祝恩民 邓艳艳
封面设计: 邹本忠 韩 实
责任校对: 齐 悦

书 号: ISBN 978-7-5610-6809-0
定 价: 32.00 元

联系电话: 024-86864613
邮购热线: 024-86830665
网 址: <http://www.lnupshop.com>
电子邮件: lnupress@vip.163.com

“新体系档案学系列规划教材”编写者单位

辽宁大学
国家档案局档案教育中心
武汉大学
吉林大学
南开大学
河北大学
山东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黑龙江大学
上海大学
辽宁科技学院
上海师范大学
郑州大学
安徽大学
湘潭大学
广西民族大学
天津师范大学
扬州大学
南昌大学
福建师范大学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西藏民族学院
中国医科大学

《档案学概论》编委会

总主编：丁海斌

主 编：丁海斌 方 鸣 陈永生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列）

丁海斌 方 鸣 刘维贵

陈永生 李文涛 李 黔

韩季红

档案学的生机在于创新（丛书总序）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流行着小平同志的一句话：“发展就是硬道理”。对任何国家或一项事业来说，停滞就是倒退，停滞就是死亡，一切事物的生机都在于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项事业都在迅猛的发展之中，档案学研究也是如此。近30多年，无疑是中国档案学自产生以来，最为辉煌的黄金发展期。

学术研究的发展，在于创新。中国档案学的发也来源于创新。创新在不断进行中，创新也在不断探索中。我们在探索中不断深化对学术创新的认识，我们在探索中不断回答如下问题：我们为什么创新？我们怎样创新？我们创新什么？这也是本套丛书的基本任务。

一、我们为什么要创新？

事有必至，理有必然。对于中国档案学者来说，学术创新来源于两个基本动因：

第一，创新是中国档案学发展的历史要求。

按照我的理解，中国档案学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发生时期（近代）的片面中国化、机关化阶段、建国初期的片面苏联化和实践催发阶段、改革开放后的从中西混杂到全面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的片面性是指学科研究对象的单一性——机关文书档案管理、学科取向的单一性——解决操作问题和学术来源的单一性——单纯本土化。其中，第一个特征影响深远，它始终是中国档案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以至于我们的“档案管理学”实际上是“文书档案管理学”；解决操作问题，是档案学研究的基本动因，所以，它必然是档案学研究初期的基本取向；而本土化一方面源于中国人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源于早期对外联系的匮乏（这个方面在这一阶段的后期有所改观）。

第二阶段的片面性是指学术来源的单一性——苏联档案学，这种片面性使建国初期的档案学理论与蓬勃发展的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之间发生了严重背离。但实践的发展给中国档案学创新以巨大的推动力，新中国自己的档案学在苏联

课本之外的实践中找到了发展的肥沃土壤，形成了一些基本概念和观念。但小苗青青在“文革”的热浪中枯萎了，停止了成长。这一时期对苏联档案学的引进，其重要功劳是部分理性成果的输入，如“全宗理论”。它使档案学不仅仅停留在操作层面，我们也开始接触了一种叫做“理论”的东西。

第三阶段是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了，这是一个中国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中国档案学发展的黄金时期。开放初期，中国档案学就如同改革开放的中国一样，开门迎客，来者蜂拥。同时，我们也开始了较大规模地向相近学科学习的阶段，模仿、移植比比皆是。中国档案学的研究者们一时不辨良莠，眼花缭乱，消化不良，一时间也不觉有些迷失了自我。但是，对自我的寻找和确立是主体与生俱来的主体意识。在经历了一段“烟红露绿晓风香”、“乱花渐欲迷人眼”之后，必然是进入寻找自我的阶段，然后渐趋达到“途我自在”的境界。21世纪以来，中国档案学渐渐进入具有独立自我意识、具有独立主体内涵的全面发展阶段。

中国档案学界曾给人一种归属感和主体性较差的感觉。这与中国档案学曾经的不成熟、不成型（缺乏具有自身体系特点的科学范式）有关。经过以上三个阶段，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中国档案学到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了。新的整合、新的体系，必须也必将逐步建立起来。

第二，创新是中国档案工作实践发展的时代要求。

当今的时代，有两大基本特征：一个是中国的特征，即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后的大发展时代；另一个是世界性的特征，即信息时代的到来。这两大时代特征，强力地影响着中国档案工作的实践，也强烈地影响着中国的档案学研究。它们极大地改变了中国档案事业的面貌，也正在改变并将更大、更深入地改变中国的档案学研究。实践要求我们不得不拓展我们的研究范围，从国家战略到虚拟理论、电子文件管理系统，再到云计算等等，它们无法回避地渐次走进我们的研究视野中，它们是时代赋予我们这一代档案学人的使命。

二、我们怎样创新？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回答“我们是谁？”的问题。即我们是由那些人组成的？我们秉承什么样的学术传统？我们在学术创新上有什么优势和不足？

我们这支队伍人数众多，但学术爱好者居多，专业研究者不多，而具有较高学术修养和实践基础的专业研究者则更是少得可怜。我们这支队伍还存在着先天不足——中国档案学的开创者们多来自实践部门，严重缺乏学术修养和哲学理性，使我们的学术体系和学术方法在形成期就缺乏严密性、规范性，更遑论形成独具特色的学术范式。在我主持或参与的研究生课堂讨论、学术会议讨

论等过程中，我发现各种错误大面积地出现在档案界所谓的学术文章、学术话语甚至正式文件中，一些违背基本科学原理的低级错误也比比皆是。缺乏良好的学术训练、缺乏丰富的实践基础，是这些文本作者的通病。

在以上情形之下，中国档案学的创新要着重强调以下三点：

第一，学术理性的统领。

在经历了三个阶段近百年的发展之后，中国档案学应更加强调学术理性的统领。新世纪的中国档案学应不再是对其他学科、其他国家相关理论的模仿、引进甚至移植，而是在哲学理性的统领下的独立创新；不再是不符合学术规范的粗制滥造。

无须讳言，中国档案界很少使用“科学精神”、“科学理性”之类的词汇，多数作者也不能真正明了它们的实质内涵。未经验证的假说、没有事实依据的猜想，甚至信口雌黄的胡说，充斥了我们所看到的刊物版面。如果您进行一次关于理性准则的调查问卷，能回答出的人一定寥寥。

学术的真实，来源于正确的逻辑和准确的事实，来源于遵守正确的理性准则。作为理性准则的方法论原理体现了理性活动的本质特征，它们反映了科学认识的基本性质。

在所有的理性准则中，我认为在中国档案学术界尤其要强调两点：

一是要普及理性信念，即普及普遍的哲学原理和科学原理，它是我们遵循基本学术研究规律、不犯常识性错误和提高理论高度的前提。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物理上的真实的东西一定是逻辑上简单的东西，也就是说，它在基础上具有统一性。”（《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380页）。理性信念构成了科学世界观，没有这种世界观的统领，我们就有可能犯试图发明“永动机”一类的错误。

二是可检验性原则。科学假说在原则上应当是可检验的，即它与某种或某些经验现象相关联。无法与经验现象相关联的假说都只是一种想象。档案学是一种实践指向很强的学问，可检验性原则的运用意义重大。

结合运用理性信念和可检验性原则，是本丛书学术创新的重要出发点。比如：笔者从哲学的基本问题出发，探讨了档案世界中的物质与意识，并将其与档案管理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总结出“档案的物理管理和逻辑管理”的理论，为研究和认识档案管理提供了一种新颖的符合哲学基本原理的学术视角和理论体系。

第二，实践——事实与需求的指引。

社会活动的具体事实是学术发展的基本养料，实践需要是学术进步的基本动力源泉。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在经济起飞、社会发展之后，需要

也必然出现学术的繁荣。社会实践的跨越式发展为中国学术形成新观点、新学说、新理论提供了难得机遇，档案学界亦然。中国档案学术界有必要就中国档案事业的快速发展给出一个富有说服力的“说法”。如果能够给出这样一个“说法”——具有充分解释力和理论高度的理论和学说，那么，不仅意味着中国档案事业的继续发展具有了理论支撑，而且意味着中国档案学获得了新的生机。

第三，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中国档案学经历了一个从单一来源到多元化的过程。目前，虽然多元化的特征已经存在，但单一来源的影响还很大。加之科学精神的匮乏，使得我们的学术研究较少争鸣和交流，应有的学术批评也很少见，偶有的争鸣也大多缺少学术规范，使得学术研究缺乏生机盎然的局面。

讲求科学理性、积极参与实践、加强交流和争鸣，是本丛书写作的初衷之一。所谓：所述或然简陋，但求蕴涵生机。

三、我们创新什么？

在经历了近百年的发展之后，在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当代档案学的创新，应强调提升理性和贴近实践。

第一，要提升理性，重点要创新具有本学科独特性的知识体系和逐步形成本学科的学术范式，它们决定了中国档案学的理论高度，可以使档案学成为立足于中华学术之林的学术奇葩。

本丛书中的《档案学的哲学与历史学原论》、《档案学概论》、《档案管理学教程》（上、下册）、《电子文件管理基础教程》等，以档案世界的物质与意识的组成与作用为基本出发点，以档案世界的空间和时间理论为重要理论基础，以档案的物理管理和逻辑管理为基本理论内涵，并贯穿了档案虚拟理论、档案事业体系论等档案学新思想、新理念，欲达到提升档案学体系之理性水平的目的。在某些方面，我们的创新具有革命性。《档案学的哲学与历史学原论》一书是本丛中纲领性的著作，它是上述理论创新的集中阐述者；《档案学概论》在框架上虽然仍保持了传统“档案学概论”的模式，但其主要内容做出了较大的更新；特别本丛书的《档案管理学教程》，采取了笔者所提出来的逻辑管理、物理管理的体系，它按照档案管理活动中的物质工具和意识工具，对档案管理活动进行了新的分类与梳理，新角度、新视野、新体系，这个新角度不是认识问题唯一的角度，但它在传统的过程论角度外，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有益的角度，实现了档案管理学多元视角；《电子文件管理基础教程》是笔者主编（或独著）的第四部关于电子文件管理的高等学校教材，保持和提升了原有的

创新体系；《档案学名著导读》则是由一支年轻化、高学历的写作团队编写的中国第一部中外档案学名著导读著作。

第二，要贴近实践，就是要使我们的研究来源于实践、检验于实践并能够指导实践，它决定了档案学的生命力。

结合科学理性，本丛书强调了贴近实践，加强了教材的实用性，特别是《档案管理学教程》、《电子文件管理基础教程》、《秘书学教程》、《公文管理教程》、《档案开发利用教程》等教材，我们尤其强调了它们的实际操作意义，力求更加贴近实践。如：《公文管理教程》以政府以及企事业单位的公文管理为视角，以公文形成、流转与管理的流程为线索，对电子政务环境下的公文管理进行系统研究，为读者提供具有较强操作性的实践工作指南；《档案开发利用教程》除通过对档案开发利用的理论阐述、方法介绍和专题强化外，还特别强调案例的分析和探讨，加强专业知识的适用性，使读者进一步提高实践操作能力；《档案编纂实用教程》则注重操作方法的指导。

认识是不断建构的产物。本丛书编写过程中，在档案界同仁大量有价值的成果中吸取了丰富养料。在此，特向这些学者表示敬意和感谢。



2011年8月

目 录

第一单元 档 案

第一章 档案的概念与属性	3
第一节 档案定义.....	3
第二节 档案的形成过程与形成理论	12
第三节 档案的本质属性与一般属性	18
第四节 档案与相关事物的区别与联系	22
第五节 档案的种类	26
第二章 档案的历史源流	38
第一节 档案的起源	38
第二节 档案信息载体进化的过程与规律	42
第三节 档案物质载体进化的过程与规律	57
第四节 档案名词术语的演变	66
第三章 档案的价值与作用	71
第一节 档案的根本价值	71
第二节 档案的基本作用	74
第三节 档案的价值特性与实现规律	77

第二单元 档案工作

第四章 档案工作概述	87
第一节 档案工作的基本内容	87
第二节 档案工作的构成与工具形态	95
第三节 档案工作的空间与时间	102
第四节 档案工作的基本原则	115
第五章 档案业务管理	120
第一节 档案业务管理机构及其职能	120
第二节 档案业务管理的基本流程	128
第六章 档案行政管理工作	143
第一节 档案行政管理工作体制	143
第二节 档案行政管理机构及其工作职责	147
第七章 档案工作的其他部分	154
第一节 档案立法与档案标准化工作	154
第二节 档案教育工作	161
第三节 档案工作的对外交流与合作	164
第四节 档案宣传与出版工作	170
第五节 档案科学研究工作	174

第三单元 档案学

第八章 档案学的属性、对象与内容	181
第一节 档案学的属性、特点与对象、任务	181
第二节 档案学的学科体系	189

目 录

第三节 档案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196
第九章 中外档案学的产生与发展·····	202
第一节 中国档案学的产生与发展·····	202
第二节 国外档案学的产生与发展·····	211
参考文献·····	214
后 记·····	217

第一单元 档案

第一章 档案的概念与属性

本章提示：

学习任何学科，都要从它的研究对象——客体出发。作为管理学科的档案学的研究对象首先是管理的对象——档案。只有当我们了解了“档案是什么”、“它是怎么形成的”、“它有什么属性”、“我们怎样将它从相近事物中区别出来”等问题之后，我们头脑中的“它”才是一个独立的事物——一个可以使我们深入认识，并对其进行管理，进而使其在社会中发挥应有作用的事物。

第一节 档案定义

关于“档案是什么”这一问题，最简洁、最直接的回答就是档案的定义。那么，档案的定义是什么？怎么给档案下定义？怎么理解档案的定义？这就是本节所要阐述的基本问题。

一、档案定义的多样性及两种基本类型

（一）档案定义多样性的原因

首先，档案定义的多样性是由档案本身的复杂性决定的。在现代社会中，档案是一种普遍存在的事物。不论是企业还是事业单位，也不论是政府机关还是社会基本组成细胞的家庭，档案都以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内容存在着。这种存在的广泛性和内容的多样性，使得档案成为一种相当复杂的事物。对于这种复杂事物，我们很难给出唯一的定义。

其次，我们在讨论档案定义时，必须考虑定义的条件和范畴。当我们给出不同的定义条件和要求时，会得出不同的定义。

第三，人类的认识水平处于不断提高的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会有各种各样的定义产生。

因此，我们可以在不同的书籍、文件、标准中看到多种多样的档案的定义。

（二）两种基本的档案定义类型

分析各种档案定义的定义条件和定义方式，我们可以发现，档案定义可以分为以下两大类：

1. 发生型定义

发生型定义是用被定义事物所反映的发生或形成过程中的情况作为种差的定义。档案发生型定义，就是对档案的形成过程、用途、保存场所等方面作出直观描述，又称为具体概念性定义。有时，当人们以某种操作性目的给档案下定义的时候，也会采用这种定义类型。这类定义首先产生在人们对档案的认识还不够深入的阶段。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它是国际档案界主要的档案定义类型。

发生型档案定义多以“文件”、“文书”、“文件和文献的总和”、“文件材料”等作为属概念。其各种种差条件比较具体、直观，如“办理完毕”、“值得永久保存”等。在这里，我们简要介绍几种典型的发生型档案定义。

1922 年，希拉里·詹金逊在他所著的《档案管理手册》一书中关于档案定义的论述为：档案是“某一管理或行政事务（无论公开的还是不公开的）进行过程中所拟就或者所使用，构成该一事务过程组成部分，事后为该一事务之负责人或其合法继承者自行保管，以备不时查考的各种文件”。^①

1938 年，我国何鲁成在他的著作《档案管理与整理》中，认为“档案者乃已办理完毕归档后汇案编制留待参考之文书”。^②

德国档案学者阿道夫·布伦内克在 1953 年出版的文集《档案学：欧洲档案工作的理论与历史》中这样论述档案的定义：“档案是某一自然人或法人在其法律性或事务性活动中产生的，并作为以往活动的查考资料和证据存放在特定场所以备永久保存的文件和文献的总和。”^③

1956 年，T. R. 谢伦伯格（美国）在《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一书中给档案下的定义为：“档案是经过鉴定值得永久保存以供查考和研究之用，业已藏入或者已选出准备藏入某一档案机构的任何公私机构的文件。”^④

1970 年出版的由法国档案管理局和法国档案工作者协会合作编著的《档

^① 吴宝康、和宝荣、丁永奎主编：《档案学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年版，第 25 页。

^② 何鲁成编著：《档案管理与整理》，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 年版，第 2 页。

^③ [美] 谢伦伯格著、黄坤坊等译：《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北京：档案出版社，1983 年版，第 18 页。

^④ [美] 谢伦伯格著、黄坤坊等译：《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北京：档案出版社，1983 年版，第 22 页。